

赵孟頫书画论稿

王连起 著

学术故宫

故宫出版社

赵孟頫
书画论稿

王连起 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孟頫书画论稿 / 王连起著.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34-1034-2

I. ①赵… II. ①王… III. ①赵孟頫 (1254-1322)
— 书画艺术—艺术评论 IV.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5447号

赵孟頫书画论稿

出 版 人: 王亚民

编 著: 王连起

责任编辑: 朱 蓝 王聪荟 李 源

装帧设计: 李猛工作室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1034-2

定 价: 160.00元

目 录

赵孟頫及其书法艺术简论 \	4
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 \	54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 \	74
谈《三希堂法帖》所刻赵孟頫书 \	118
赵孟頫《天冠山诗帖》考辨 \	138
赵孟頫伪书丛考 \	146
赵孟頫《国宾山长帖》考 ——兼评赵孟頫款《苏轼古诗帖》 \	166
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 \	174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真伪鉴考 \	224
赵孟頫早期书札考 \	244
谈赵孟頫画竹题材问题 \	272
赵孟頫传世小楷《妙法莲华经》卷三、卷五考 \	296
后 记 \	309

赵孟頫
书画论稿

王连起 著

故宫出版社

目 录

赵孟頫及其书法艺术简论 \	4
赵孟頫《道教碑》真伪考 \	54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 \	74
谈《三希堂法帖》所刻赵孟頫书 \	118
赵孟頫《天冠山诗帖》考辨 \	138
赵孟頫伪书丛考 \	146
赵孟頫《国宾山长帖》考 ——兼评赵孟頫款《苏轼古诗帖》 \	166
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 \	174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真伪鉴考 \	224
赵孟頫早期书札考 \	244
谈赵孟頫画竹题材问题 \	272
赵孟頫传世小楷《妙法莲华经》卷三、卷五考 \	296
后 记 \	309

赵孟頫生平思想简介

赵孟頫，字子昂，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是宋太祖之子德芳的后裔，其高祖伯圭和宋孝宗是兄弟，始赐第湖州，故赵孟頫为吴兴人。其父赵与峕，宋度宗时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喜爱诗文书画并有收藏，这对幼年的赵孟頫是有影响的。据《辍耕录》记载，子昂五岁时写的字，就已经被人拿去卖钱了。其母丘氏系偏房。兄弟八人中他排行第七。十一岁，父卒，由其母抚育教导发愤读书。“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元史》本传说他“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这就是后人所谓的赵七司户的由来。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去上任，因为真州（今扬州附近仪征、六合一带）当时已是边境战场，一个宗室少年是不会冒险赴任这微不足道的职位的。有一个旁证可说明这个问题：赵孟頫写的《五兄圻志》^[1]，言及赵孟頫也是十四岁以父荫补承务郎，事在咸淳丁卯（三年，1267年）之前，七年后甲戌“授签书高邮军判官厅公事，未上”。这时的老五起码已二十一岁，却还是“未上”。原因是相同的：以父荫补个职衔，领一份俸禄，同清代宗室子弟的承恩、奉恩将军一样，根本不需上任。在他二十三岁时，元军进入临安，南宋事实上亡国。

关于赵孟頫的生平，杨载为之所撰行状^[2]、欧阳玄为之所撰神道碑^[3]、《元史》赵孟頫本传记之颇详。后人又有年谱、系年、研究等。之所以在这里还要作简要介绍，是为澄清我认为必要的涉及其评价的一些问题。宋亡后，赵孟頫在家乡“益致力于学”，学术上师从敖继公。受南宋浙东叶适、陈亮的龙川、水心学派影响，不仅仅讲义理，而更重视经世致用。艺术上与钱选等研习绘画。同戴表元等讨论诗文。并常往来于湖州和杭州之间，同聚集在杭州的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收藏家周密、戴表元、白斑、仇远、王芝、郭天锡、高克恭、李衍、鲜于枢等品评书画，研讨艺文，互相陶冶。杭州

[1]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外集。

[2]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附录。

[3]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

是南宋故都，不仅人物荟萃，且是当时的文物聚散中心。赵孟頫在此，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学识。其名声也越来越大，不但名列“吴兴八俊”，而且“声闻涌溢，达于朝廷”了。这时，元统一的大势已定，元世祖忽必烈认识到统治这中华大帝国，必须要笼络汉族士人。所以早在伯颜大军刚入临安时，元世祖就命人“行台江南，且求遗逸”。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再次命程文海（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三十三岁的赵孟頫，便是这次搜访的首选。据杨载所撰的赵孟頫行状和张雨跋赵孟頫书《杂书三段》卷可知，在此之前，吏部尚书夹谷之奇，道士杜道坚，都曾推荐过他而遭拒绝。这一次为什么成行？可从他刚到大都送朋友的诗中得些线索：“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4]所谓“搜访”，原来是“捉拿搜寻”。清陆心源《宋史翼》引《东阳县志》说得更明白：“时元主方求索赵氏之贤者，子昂转入天台山依杨氏，为元所获。”与赵孟頫一起被“搜访”到的吴澄，在虞集为之撰写的行状里，也说是被“强起”的。今存世最早的赵孟頫书札是被程钜夫“搜访”后给郭右之的二札之一，言及“此番应酬失宜，忧烦不可言……”所以，这个举荐是强迫性的。当然，赵孟頫自己思想的转变还是主要的因素。正值壮年的赵孟頫，深受儒家兼济思想影响，要作番事业，就必须走忠君体国的出仕道路。所谓“士少学而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5]另一方面，赵孟頫虽为宗室，却对南宋政权有较清楚客观的认识而少留恋：“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6]作为宗室，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而“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7]，更为南宋朝廷的偏安苟且腐败无能深感耻辱。实际上，宋朝在澶渊之盟以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里，一直用百姓血汗向北方的辽金等岁输币帛以换取苟安，到后来更厚颜无耻到向人称叔称伯。当1275年伯颜大军逼近临安时，南宋朝廷还想以“尊世祖为伯父而世修子

侄之礼，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的故伎来换取苟安。偏安东南一隅，版图、人口都很有限的南宋政权，要进行怎样的压榨剥削才能搜刮到这些财富呢！这样毫无起码尊严的屈辱腐朽政权，如不败亡那倒是奇怪了！难道赵孟頫因为是宗室就必须为它做殉葬品吗？赵孟頫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做出了出仕的选择。

[4]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三《送高仁卿还湖州》。

[5]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送吴幼清南还序》。

[6]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四《岳鄂王墓》。

[7]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四《和姚子敬秋怀五首》之三。

元世祖一见到赵孟頫，便为之倾倒：“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8]关于赵孟頫的形象神采，还有一个故事：田衍初见赵孟頫，竟是凭人说其相貌在大都街上认出的。赵孟頫正在走路，忽然有人问他：“君非子昂乎？”这就是田衍。问他何以知之，回答曰：“闻诸鲜于伯几，赵子昂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师数年，未尝见若人，非君其谁？”^[9]靠人介绍能在几千里外认出其人，若非有惊人之貌是不可能的。当然，除了天生的仪表美外，还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极好修养，才能使气质风度不凡，否则是不会有这样的神采和魅力的。而这很大程度上又是优秀民族文化滋润陶冶的结果。这对构成赵孟頫的审美意识、艺术特征，特别是书法的艺术风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政之初的赵孟頫，认为是自己施展抱负，显示才能的机会到了，为元世祖起草诏书，他“挥毫立就”，世祖认为是“得朕心之所欲言者。”而对“至元钞计赃论罪”的讨论，不但体现了他非常关心国计民生，并且还具有卓越的政治经济才能和见解。^[10]其后，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抵制元蒙统治者的政治残暴。同刘宣一起巡查江南推行至元钞法时，置权相桑哥的严命于不顾，“遍历诸郡”“未尝笞一人”。并不顾地位低下，积极参加了铲除桑哥的活动。

赵孟頫的这些见解和活动，赢得了元世祖对他的宠信，也招致了蒙古权贵的忌恨排挤。在朝五年，使他逐渐看清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残酷，皇室政局的变幻莫测。让他认识到“岂知佐理自有材，勉强尽瘁终无补”，自己并不能施展才能和抱负。所以当年迈的元世祖让他充当耳目，似乎非常信任他时，他却“自是稀入宫中，力请补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以“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出守济南。在山东期间，他为政清简宽厚，平冤狱，办学校，关心百姓疾苦。但同在朝一样，也受到地方蒙古官员的排挤。因此，他对官场生活更加厌倦。在《岁晚偶成》诗中写道：“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雪水头。老子难同非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纓久判随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退隐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元贞元年（1295年）夏，元成宗以修《世祖实录》诏

[8] 元·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简称《行状》。

[9]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八《田氏贤母之碑》。

[10] 姚公骞《松雪斋集校后记》，《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

赵孟頫进京入史院，他以病辞回吴兴老家。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不是辞官不受，就是请假还乡，用以摆脱朝廷的羁绊。如大德元年（1297年），朝廷任命其为太原路汾州知州，他没有去。大德二年（1298年），召他进京写金书《藏经》，事毕留他入“翰苑”，他“力请归”。至大二年（1309年）升他为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桑事，他还是不去。至大三年（1310年），他刚被召到大都授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又“谒告归”。皇庆元年（1312年），赵孟頫被刚即位的元仁宗召至京师，任集贤侍讲学士，并推恩两代，他还是以祭祖为名还乡，直至半年后被再次召回。从四十二岁后每次还家，都非朝廷诏令不还。所以他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贪图富贵而留恋官场。他的出身地位与吴澄等是不同的。他是元朝廷用以“藻饰太平之美”^[11]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凡经历过朝代更替的人当有体会。“自知世事都无补，无奈君恩不许归”，是很难轻易摆脱牢笼的。这期间，他只接受了一个职位：大德三年（1299年）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是管理学校教育，考校呈进著述文字的闲散官职。署于杭州。早在至元丁亥（二十四年，1287年）九月，赵孟頫就慨叹因居官南北奔走而无暇在书法上用功。现在如愿以偿了。不但有时间挥毫染翰，而且又可以同老朋友戴表元、鲜于枢、王子庆等品评书画（王子庆此时为元秘书库在杭州装裱内府书画）、研讨艺文了。并以公务之便，更广泛地结交了各地的文人学子，各方面修养更加深厚。南北宦游阅看了大量公私书画，经过心摹手追，玩味升华，作为营养吸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且逐渐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传世作品也日见增多。

赵孟頫为官三十余年，人称“荣际五朝”。但只有元仁宗时，才得到较高的职位。元仁宗是元帝王中接受汉文化较深的一位，做太子时对赵孟頫就很赏识。尝诏侍臣曰：“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并将子昂与唐之李太白、宋之苏子瞻并论。赵孟頫由翰林侍讲学士升为集贤侍读学士、正奉大夫，再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进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为从一品官并推恩三代。元仁宗称赞子昂有七件人所不及的优点，曰：帝王苗裔、状貌昉丽、博学多闻、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

老。可谓褒奖之至，但没有一件言及他的政治才能。这说明，蒙古皇帝只是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看待。所以，也就在这

[11] 见元朝廷给赵孟頫的《谥文》。《松雪斋集》附录。

一年，他写了一首《自警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即道出了内心的苦楚，说明只有艺术上的进取才能使精神上得到慰藉。并且预感到了身后之谤。这种思想，同样也表现在《酬滕野云》诗中：“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计。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雪溪春水生，归志行可遂。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只有退隐，才能减轻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只有诗文书画，才能给精神带来寄托。延祐六年（1319年）五月，六十六岁的赵孟頫，再次“谒告欲归”，并获准还乡。途中，他的妻子管道昇死在临清舟中。这对赵孟頫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管夫人不但诗文书画皆通，而且非常理解赵子昂，精神上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和安慰，从赵孟頫给中峰和尚信中，可见其感情之深。从此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这位大书法家在故乡家中“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时”死去。享年六十九岁。元朝廷追赠他为江浙等处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赵孟頫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艺术大师，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对文人画的发展，可称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划时代的贡献。董其昌称其画“为元人冠冕”，元四家都是由他“提醒品格”。他精通音律，著有《琴原》《乐原》两篇关于音律方面的专著。精通篆刻，著有《印史》，其序文也收在《松雪斋集》中。其诗文，在元代文学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为文清约典要，诸体诗造次天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还是一位文物鉴定家，“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12]

赵孟頫曾著《古今文集注》，杨载所撰行状、元朝廷的谥文、欧阳玄撰文的神道碑，都有记载或评价。可惜今已失传，但其序尚存《松雪斋集》中。他明确指出“古文尚书”是伪书。^[13]此问题始于朱熹，至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此案才似了结。今天究竟如何评价此事非本文所关。子昂所持论据，与朱至阎诸多论者的异同，亦不在此考校。这里要探讨的是，他为什么要治《尚书》呢？从他反对“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14]的倾向，而主张“一以经为法，一以理为本”，^[15]并提倡“士少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再联系到他虽处于程朱

[12]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

[13]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

[14]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第一山人文集序》。

[15]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刘孟质文集序》。

理学笼罩着学术思想的时代而对之绝口不谈，却宁可对释、道之徒持弟子礼来看，他将《尚书》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应是针对南宋以来那些尚空谈，不理世事，只知讲明心见性，封建伦理纲常，而视文艺为枝叶（更视书法为小道）的道学家们的。赵孟頫精研这儒家的经典《尚书》，大概是要从根本上揭露这些“不拘经意训诂，凭己意说经”的道学家们的虚伪。而他“旁通佛老之旨”，且“造诣玄微”，又可映照出道学家的一些所谓学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联系他以宋宗室出身而仕元以及初出仕时的活动，特别是对发行至元钞的见解综合起来看，他的思想似受南宋陈亮、特别是叶适等人的影响，是不太理会程朱道学思想束缚而比较活跃、进取的。《宋元学案》将之归于“艮斋学案”。当然，这种倾向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中晚年之前。上举三文，皆未言及子昂此书著于何时。唯元人何贞立在《松雪斋文集序》中有：“仆又尝见公所著《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写。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因知其为盛年作。^[16]赵孟頫在各种文艺领域发扬蹈厉，勇于进取，并获得杰出成就，他的这种思想应当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且，赵孟頫不仅自己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还直接带动和影响了元代一大批文艺家。不要说赵雍、王蒙、俞和、崔彦辅，就是黄公望、朱德润、唐棣、陈琳、王渊、杨载、柳贯、虞集、康里巎巎等，也莫不得到过赵孟頫的指教、点拨或提携帮助。在元代这个特殊的朝代，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统治了中国，中华民族固有的先进文化受到压抑和阻碍的时候，赵孟頫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和不懈的奋斗努力，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个历史的作用应当说是巨大的、不朽的。因此得到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评价。但到明末清初，由于审美标准的改变，特别是民族矛盾的尖锐，才出现了对他的各种歪曲——从贬低他的书法艺术到编造史实污蔑

他的人品。而根源皆出于他的宋宗室出身而仕元。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看到：

一、赵孟頫在宋亡时，既不是持节的文臣，也不是拥兵的武将，仅是与宋帝同宗的青年，不应负这亡国的责任。他的出仕元朝，是宋实际亡国十年后的事。所谓变节或投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联系到与他前后出仕元朝的其他人，如程钜夫等却不受这种指责，更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从封建家

[16]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六有《赵子昂重辑尚书集注序并画像》一册，所录序文较《松雪斋集》录文长约两倍，其中云：“集注始于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赅成于大德元年，今又二十余年矣。”亦说明著于早年，但未见此墨迹原件。不能作为确证，附此以资参考。

天下立场出发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宋遗民周密要比这些人明白得多，他对赵孟頫与对留梦炎、方回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17]

二、赵孟頫仕元，从政治活动到人品，无劣迹可言，而是一个比较正直宽厚、并有相当才能和见解、关心国计民生的封建士大夫。什么骨力乃弱，酷似其人；什么软媚、奴书之类因歪曲其人而贬低其书的评论，都是毫无根据的。作为艺术评论或艺术史，主要应从艺术本身的特质，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家的创作，从具体的发展中估价其得失对比关系，从而确定他在本门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三、赵孟頫由于特殊的出身、经历和环境，思想上确实常常有矛盾和痛苦。但由于他各方面的学识和修养，他没有因受宠而得意忘形，也没有因失意而哀号暴怒，而是以艺术上执着的追求和创作成就来冲淡转移这内心的不平。这就造成了他性格虽正直宽厚却温文尔雅，隐忍内向。折射在艺术气质特别是书法风格上，就表现为意度清和，风格暇整，精审流丽，飘逸而又深沉。这就是个人性格、气质对其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吧。从这一点看，倒确实是书如其人。

赵孟頫的书风承继和书学主张

赵孟頫的书学见解是完全服从于他的以复古为旗帜扭转南宋书风颓势的改革主张的，同时也完全体现着他的审美理想。针对宋人的纵肆躁露和轻视古法，他力主学习晋人的姿韵和唐人的法度，并通过反复地探索比较、创作实践，终于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关于赵孟頫的学书师承和风格特点，前代评论的人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明初的宋濂和解缙。宋濂在跋赵书《浮山远公传》时说：“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宋高宗）、中学鍾繇及羲、献诸家，晚乃学李北海。”解缙在其《书学传授》中云：“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文嘉、詹景凤等

[17]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嘲留忠斋”条记云：“赵子昂入觐之初，上命作诗嘲留忠斋云：‘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好将忠孝报皇元。’留以之衔恨之终身云。”此事亦见杨载行状。诗句有所不同。留忠斋即留梦炎，为南宋降元之臣。《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条，对降元的方回也表示了极大的鄙视和无情鞭挞。而对赵孟頫仕元，却未见微辞，依旧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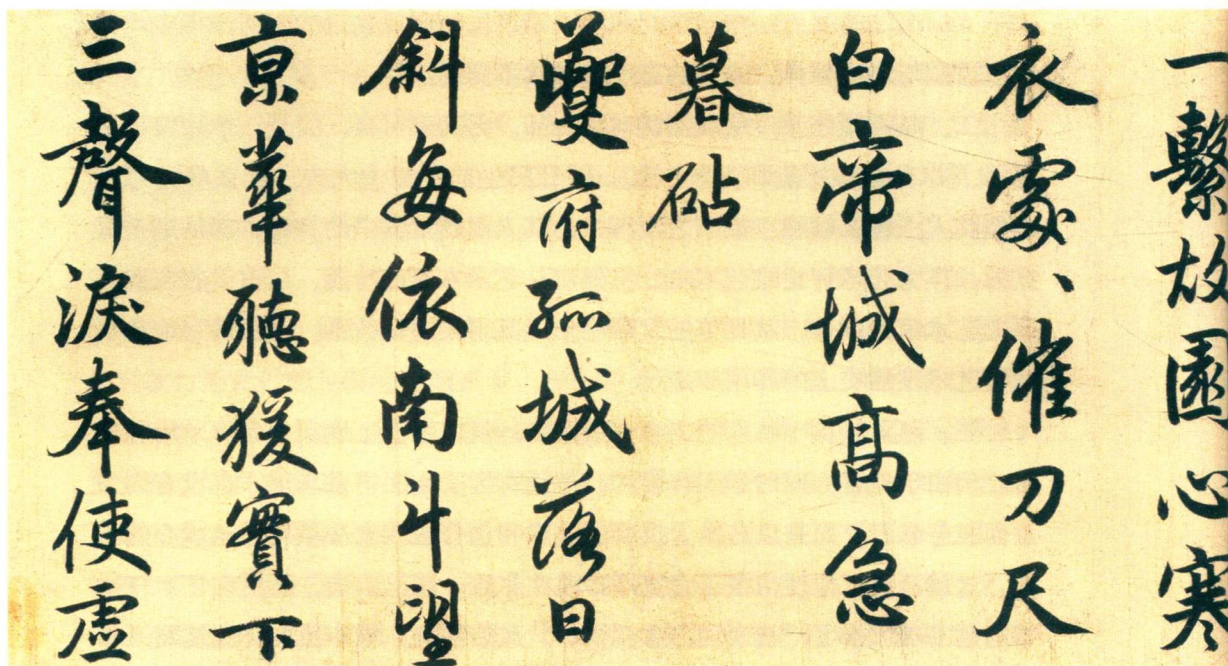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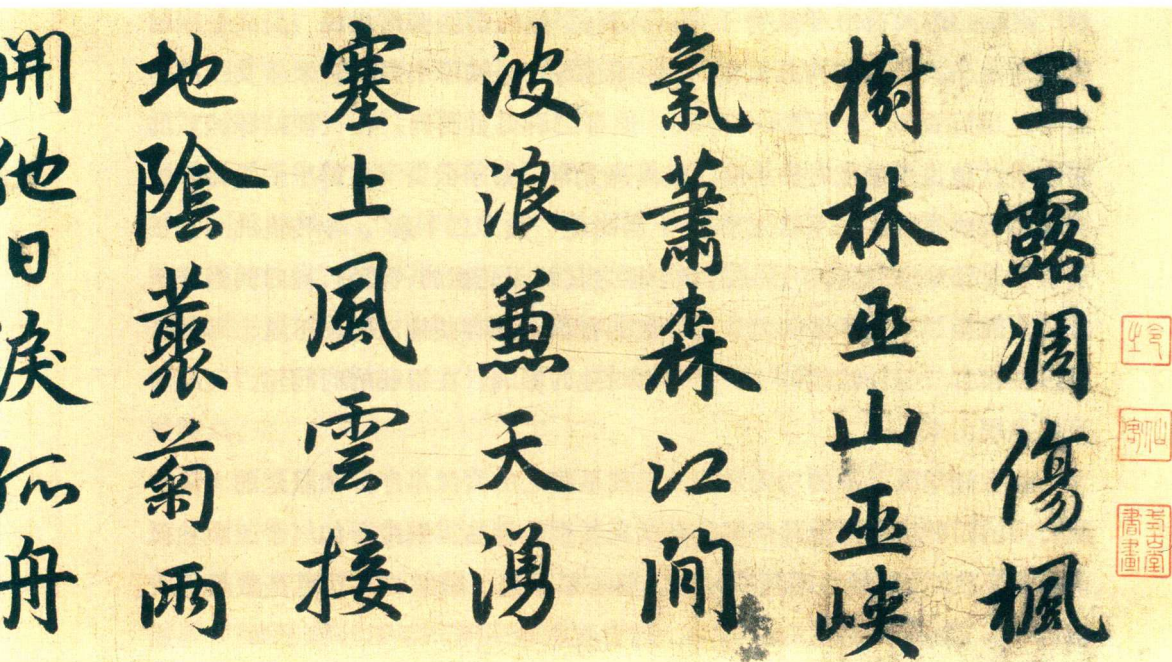


图1 赵孟頫《行书秋兴诗》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甚至说赵孟頫还学过沈馥的《定鼎碑》。

后来的评书者，信宋濂之说的人较多，信解缙之说的也不乏人。以今日所见赵书论，多认为宋濂之说颇有道理，解缙之论，则显得与事实不太符合。陶宗仪《辍耕录》卷七云：“公（孟頫）偶得米海岳书《壮怀赋》一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拓，以补其缺，凡易五七纸，终不如意，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说明所谓“得南宫真传”，对子昂似乎是虚誉。中年以后很多赵书的笔性，也确实同米书不同。至于张即之书，其躁露怒张，与赵书的蕴藉虚婉更是相左，是赵书极力要纠正的。说赵孟頫“初学思陵”，如果是指其幼时所习，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子昂是宗室后裔，高宗书又是南宋书家之冠。今赵孟頫存世最早的墨迹《秋兴四首》（即《行书秋兴诗》（图1），据帖后至治元年（1321年）跋云为40年前书可知，这是他30岁的手笔。“匡衡”的“匡”字尚避宋讳。确实有些像宋高宗。高宗初学黄，后学米，最后归于二王，面貌却似智永。而赵孟頫早年也学智永，而且影响颇深，似高宗也有殊途而同归的可能。“中学鍾繇及羲、献”则过于泛论而没有先后区别和侧重。那么，“晚学李北海”呢？从存世赵书几个碑的原底墨



迹《松江宝云寺记》《昆山淮云院记》《帝师胆巴碑》《杭州福神观记》《仇锸墓志铭》等晚年书碑看，或有些李北海书的影响。但同时，也能看出苏灵之、张从绅、柳公权的影响。至于赵孟頫的书札、诗文、题跋，则不论艺术晚期的任何阶段，以至最后时刻，也基本不用李北海法。所以，关于赵氏书风的三段论，也是不确切的。要把握赵孟頫的学书师承和风格变化，还要看他自己的论述和他的作品。

赵孟頫四十五岁前的作品，最能流露他的学书师承。学习哪一家，笔端就出现那一点的特点痕迹，正如其跋自书《千字文》说的：“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这期间的作品，存世约二十件。以小楷跋《曹娥碑》（33岁）、《楔帖源流》，行书跋《大道帖》（34岁），《归去来辞》（44岁），草书《千字文》（33岁）、跋《保母砖帖》（34岁）等帖为例，可以看出，他早年除因宗室关系少时必然要学高宗外，主要是学鍾繇、智永、褚遂良、徐浩等人。其用笔古拙、结体方阔，是学鍾、学褚；其肥厚圆劲、捺笔特重，则明显是受智永、徐浩的影响。这一点，在他自己的叙述和当时人的评论中，也都可以得到证明。赵孟頫元贞元年（1295年）自题其书